

侨乡研究

# 广东潮汕地区海外移民形态的新变化<sup>\*</sup>

黄晓坚

(韩山师范学院 华侨华人研究所, 广东 潮州 521041)

[关键词] 潮汕地区; 侨乡研究; 海外移民; 自由移民; 旅游贸易; 非法务工

[摘 要] 论文介绍了广东潮汕侨乡自由移民的历史传统, 分析阐述了该地区移民形态以及与海外经济联系的变化。改革开放后, 广东潮汕地区的人口迁移, 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侨乡人口迁移从传统的海外自由移民与国内移民并重, 转变为以国内移民为主、海外暂居为辅, 从而加速了海外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国内归侨侨眷社会向侨属社会的转变。随着侨汇的枯竭, 侨乡相应衍生出“旅游贸易”和“非法务工”等涉外经济形态。它的产生和发展, 实际上是当今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国际流转在潮汕侨乡的具体体现。往返于侨乡和海外、从事海外贸易和劳工作业的群体, 带有传统意义上的“侨”的色彩。这些新的侨情变化, 应该引起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中图分类号] D6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 (2013) 01-0020-11

## New Migration Pattern in the Chaozhou-Shantou Area of Guangdong Province

HUANG Xiao-jia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521041, China)

**Key words:** Chaozhou; Shantou; qiaoxiang studies; migration; overseas tourism; undocumented labor; qiaojuan; qiaoshu

**Abstract:** Since late 1980s, a new migration pattern has emerged in the Chaozhou-Shantou area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is new pattern, people from the Chaozhou-Shantou area have chosen booming cities in the Zhujiang delta or domestic metropolis instead of traditional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s their migration designations. Some of them would still go abroad for a short-term stay to do business or to work as undocumented workers but not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Due to a lack of supply of new migrants coming from their hometowns,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have loosened their ties to the originated places of their old generations. In turn, qiaoxiang in the Chaozhou-Shantou area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It is no longer the place inhabited predominantly by direct relatives of overseas Chinese (qiaojuan) but instead it is now inhabited mainly by individuals having connections

[收稿日期] 2012-11-07; [修回日期] 2013-01-08

[作者简介] 黄晓坚 (1961—), 男, 韩山师范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侨乡、归侨侨眷以及华侨与抗日战争等。

\* 本文系 201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闽粤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互动 (1978-2010 年)》(项目批准号: 12YJA850009) 之阶段性成果。

with indirect relatives overseas ( qiaoshu ).

侨乡研究是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也是中国学者进行华侨华人研究的优势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侨乡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出版了相当多有分量的成果。如黄晓坚、黄静、张应龙等人根据侨乡变化情况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侨乡，<sup>[1]</sup>丰富了已有的侨乡研究成果，拓展了侨乡研究思路。诚然，侨乡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移民的大量出现以及海外侨情的迅猛变化，侨乡发展呈现出值得学术界重视的新趋势。然而，受各种因素影响，当代侨乡的诸多深刻变化尚未得到研究人员及时的跟踪与关注。

侨乡的发展变化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侨乡发展的诸多方面中，人口迁移问题无疑至关重要。侨乡之所以有别于其它地区，就在于它具有一定规模的海外移民，以及当地民众与海外移民在经济、文化、社会乃至政治上的紧密联系与相互影响，其中移民数量的多少则是判断特定地区是否为侨乡的主要依据之一。侨乡民众迁移的方式、规模、结构等，不仅影响到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的关系，更影响到侨乡社会的发展走向。

潮汕地区位于粤东沿海，历史上侨居海外的人口众多，是广东省著名侨乡，与广府、客家侨乡齐名。但据有关统计和研究，改革开放后，潮汕地区出国定居的人数很少，与其他侨乡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从侨乡类型学来看，潮汕侨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发展趋势如何？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在韩山师范学院、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侨联和教育部的立项支持下，笔者及课题组成员<sup>①</sup>先后赴潮州市潮安县磷溪镇、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和揭阳市榕城区仙桥街道，开展以“潮汕侨乡的海外联系”、“传统侨乡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和“闽粤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互动”等主题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此期间，笔者还曾到泰国曼谷和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与来自潮汕地区的商人、当地华社领袖多方接触，了解到不少相关信息，掌握了侨乡发展变化的一些新动态。在上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有关文献资料，针对潮汕地区民众的人口迁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梳理潮汕地区自由移民的传统，接着考察不同历史时期侨乡民众的两种流动路径——内迁和外移及其相互关系，最后就当前侨乡民间普遍存在的海外贸易和务工现象进行重点剖析，力图对改革开放以来潮汕地区海外移民形态的新变化及其性质进行科学的界定。本文不仅肯定了作为当前中国传统侨乡海外移民重要形态——“旅游贸易”、“非法务工”群体的涉侨性，还首次提出了中国传统侨乡已经由归侨侨眷社会转变为侨属社会<sup>②</sup>的重要观点。

## 一、自由移民海外的传统

潮汕地区依山临海，自古以来便有舟楫之利，民众侨居海外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唐宋时期的海商“住冬”、“住番”，宋末勤王抗元、崖山兵败后，大量潮籍将士逃亡南洋以及明朝张瑄农民起义军遭镇压后出走苏门答腊和柔佛等地。明代以后，朝廷继续厉行海禁，但仍有百姓私自从

① 参与田野调查的课题组成员，有韩山师范学院的陈雍、杨姝、李坚、熊燕军以及部分学生。

② 在汉语词语释义中，“侨属”等同于“侨眷”，均指华侨的眷属。但在中国侨务政策上，“侨属”与“侨眷”则具有不同的涵义。“侨眷”享有政策优待，限定为同华侨、归侨有抚养关系的亲属，即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同华侨、归侨有长期扶养关系的其他亲属”，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对象。从传统侨乡的情况来看，从前华侨出国，其典型的做法是留下发妻和长子长孙在原籍供奉父母，并寄回侨汇赡养家人，因此华侨与原乡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人员交往。随着第一代、第二代华侨华人的相继故去，海外华人社会与国内侨乡社会的亲缘关系愈益疏远，侨乡政策意义上的归侨侨眷已经很少，其与海外的民间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侨属关系，通俗地说即一般的亲戚关系。

事海上贸易，以至发展为林道乾、吴平、林凤等海上武装贸易集团啸聚海岛，与朝廷兵戎相向。林道乾失利后率部两千余人避居今泰国南部，被北大年国王招为驸马，乐不思蜀；其妹林姑娘南下寻兄，劝其回国未果，乃以死相谏，至今仍留下受人进香膜拜的坟冢和美丽凄婉的传说。

不过，潮人大规模出洋侨居，还是始自清代乾隆十二年（1746年）。这一年，清廷海禁稍弛，潮人及福建人获准持照到暹罗贩运大米、木材。特别是郑王复国后，泰国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先后在湄南河两岸建都，吸引了大批来自潮州的能工巧匠。他们以自由劳动力的身份和善于经商的传统，利用当地宽松有利的环境从事各种商贸活动，获得了成功。伴随着“红头船”<sup>①</sup>贸易的兴起，位于澄海的樟林渔港迅速发展为繁华的“粤东通洋总汇”，潮梅乃至闽西南先人多由此乘船“过番”谋生。距樟林港仅十余公里的隆都前埔，其村民许可均等人即于彼时“合伙租船往暹罗贩运大米，每年农历八、九月从樟林港扬帆出海，翌年春季才运载回归；碰到天时不利无法按时归棹，有的人看那里地缘好，便设法藏匿起来”，<sup>[2]</sup>是为隆都最早移居泰国的先民。此后零星过番或成批下海往暹罗谋生的隆都乡民渐多。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后溪人金罗星乘红头船抵暹，创“宝记”号经营航运业、进出口贸易及土产，该商号现仍坐落在曼谷吞府湄南河边，与黄利为近邻；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溪陈村沟头人陈少林因家贫“过番”去暹罗，一年后即开始有“番批”寄回家，其父母妻儿在村中引以为豪；咸丰四年（1854年），前埔黄厝堤段崩溃，洪水冲毁家园，灾民纷纷设法到暹罗，至清末时共达180人。<sup>[3]</sup>据估算，从1782年至1868年，乘红头船移民暹罗的潮人达150万人之多。同治十年（1871年），隆都前美村前溪人陈宣衣长子陈慈黄，从香港“乾泰隆”商行过海到暹京曼谷创办黄利行和火碓厂，专营暹米加工、运销和批发，并相继把事业扩展到南洋各地，将暹京黄利行与新加坡陈生利行（后改组为陈元利行）、香港乾泰隆行和汕头黄利栈连成一体，生意火爆，富甲南洋，促成前美村人相继去“过番”，很多人侨居暹罗。

从1861年汕头开埠到辛亥革命，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潮汕一带出现大量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加上1867年汕头港远洋轮船开航之后海外交通更加便利，以及殖民者以汕头妈屿为基地大肆掠夺猪仔华工，导致潮汕地区前往海外的人数大增。据估算，1864—1911年，约有294万人出洋侨居。<sup>[5]</sup>民国时期，中国政府严禁猪仔贸易，但延绵近两百年的向海外的自由移民，在潮汕地区仍然得以持续进行，他们大多侨居泰国、马来亚、柬埔寨和香港经商、务工。而在大革命失败后和二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时期，潮汕地区又掀起了两次出国高潮。与此相关的是，潮汕地区迅速成为与海外潮人联系密切的著名侨乡。

值得注意的是，从乾隆年间潮人赴泰贩运大米和木材起，特别是郑王复国后，潮州人就络绎不绝地搭乘“红头船”前往泰国经商和务工。即使是在19世纪中期猪仔贸易盛行的年代里，自由移民泰国的现象也从来没有中断过。有首流行至今的“过番歌”，生动地描述了从前潮人自主赴泰谋生的情景：

“天顶一只鹅，阿弟有姆（老婆）阿兄无。弟妇抱仔喊阿伯，阿伯想着无奈何。又小李，又小桃，包裹拍拍过暹罗（泰国）。 ”<sup>②</sup>

连绵不绝自由移民泰国，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传统移民链的背景、海上交通的便利以及泰国较

---

① 清制，福建出海民船船头一律涂青（绿）漆，粤船则着以红色，以示区别。据考，“红头船”一般长约30余米，宽10余米，有舱房若干层，分三桅和双桅。船头画大眼，冀能识水路。

② 这首“过番歌”有诸多版本。歌谣中的“阿兄”，其侨居泰国的原因实际上还是为了摆脱贫困，娶不上老婆只是个借口而已。

易谋生的自然、社会条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泰国是东南亚地区唯一未被殖民化的国家，这使得潮人的自由移民未受到来自西方殖民主义的过度干扰，从而成为与猪仔贸易体系下劳工强迫移民并行不悖的另一重要移民形态。

两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潮人移民源源不断地注入泰国潮人族群，造就了潮人在泰国华社中举足轻重的强势地位。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侨委会曾多次统计世界华侨人口数量及其分布，其中泰国一直估计为 250 万，占居侨居地首位。<sup>[6]</sup>另据统计，从 1869—1934 年间，由汕头口岸进出口外洋的旅客，分别是进口 4,151,665 人、出口 5,552,476 人，出超 1,400,811 人。<sup>[7]</sup>应当说，这是潮人自由移民传统的必然结果。

19 世纪中期以后，东南亚各土著王国和英属殖民地的开发需要劳工，随着潮人“香一叻一暹一汕”贸易体系的扩张，加之海上便利的交通，潮人移民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和香港者越来越多。

## 二、从“外移”到“内迁”

潮汕地区民众的海外移民并非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中国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受到来自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影响。二战后，东南亚殖民体系解体，民族国家纷纷独立，加上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冷战”局面的形成，东南亚各国出于民族利益保护和“防共”的需要，纷纷关闭了接纳中国移民的大门。潮汕地区延绵两百余年的海外自由移民传统，因之戛然而止。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同东南亚各国逐渐恢复关系；而在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民间来往的大门亦经由探亲、旅游的渠道渐次开启。不过，时隔 30 余年，由于国内外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此时潮汕侨乡人口向外迁移、流动的轨迹，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首先，是海（境）外迁移人数的锐减。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泰、中马、中印（尼）、中新相继建交或复交，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外民间交往的恢复，东南亚一度成为中国新移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少量潮汕地区民众亦经由继承财产、婚姻等途径前往定居。不过，与 1949 年前相比，此时国外迁移的规模已经显得很微不足道了，更多的则是因出外经商而短期居留。据潮汕地区官方披露的统计数字，新中国成立至 2008 年，潮汕地区“经有关部门批准出国定居的共 22,311 人；出境往港澳定居的共 31,530 人。此外，尚有少数潮人因上山下乡或读书在国内其它地方申请出国留学或赴港澳以后再出国而成为潮汕新移民。”<sup>[8]</sup>平均每年两三千人的规模，既无法与清代、民国时期的潮人海外大移民相提并论，跟国内其它区域相比亦毫无优势可言。

以下两表虽不完整，但足以窥见潮汕地区海外移民之概貌。

两表说明：第一，改革开放后潮汕地区海外移民很少，甚至比不上境外（香港、澳门、台湾）移民数量；第二，海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加拿大和澳洲，传统移民目的地东南亚已经居于次要的地位。

鉴于潮汕地区不存在明显的海外非法移民现象，上述推论基本上是可可靠的。从本课题组在隆都镇田野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当地通过涉外婚姻和留学定居海外的案例确实极少，<sup>①</sup>情况与之相符。

其次，是国内迁移人数的剧增。据估计，潮汕人在深圳的规模迄今已达百万之众，<sup>②</sup>早在 20

---

① 例如，在该镇拥有 6000 余人口的前美村，只有两人留学定居欧美；2008—2011 年，该镇 7 万余人口，涉外婚姻只有 5 对。（澄海区民政局提供资料）

② 具体数量有不同说法，少则 80 万人，多则 280 万人。

世纪 80 年代他们就已涌向那里。除在工厂打工、开快餐店外，他们主要从事“土多”（store）便利店、农贸市场和专业集贸市场的商品批发，如深圳通信市场、电脑市场、湖贝路批发市场等。亦有从事房地产业和 IT 业者（如市值 3000 余亿元的腾讯控股董事局主席兼 CEO 马化腾）。潮汕人云集的地方，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以及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南京、重庆、成都、郑州这样的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据估计，目前潮汕地区移居国内各地的流动人口，除深圳、广州各有 100 万人外，东莞有 70 万人，上海有 60 多万人，海南省也多达 80 万人。就笔者调研的溪口村村民流动目的地来看，以前往东莞经商致富者较多，其显著标志是村中建起的诸多豪华洋楼。

民国时期，潮汕地区的先民多前往上海、香港和南洋一带的新加坡、泰国、柬埔寨等地发展，海内与海外并重，俗语有“一上二香三叻四暹五汕六棉”之说，即依次为上海、香港、新加坡、泰国、汕头、柬埔寨。不过，如今的重大变化，就是迁移目的地已经主要局限在中国国内——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移居海外的不多。那么，造成移民路径变化的因素是什么呢？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

第一，东南亚移民“拉力”的消失。东南亚尤其是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历史上潮汕地区民众海外移民的主要聚居地。但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南亚国家相继对中国开放个人探亲、旅游后，中国人除了收养、通婚的途径，一般很难在当地定居。新加坡虽有鼓励新移民的政策，但却有学历、资产等方面的苛刻限制。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并逐渐赶超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对中国海外移民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而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于泰国和东南亚经济形势不太好，做生意不容易，还有很多签证、定居方面的限制，潮汕人前往经商的近年来已逐渐减少。

第二，中国市场经济的吸纳。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广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从农村中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以深圳等 4 个经济特区的建立为突破口，引入市场经济，私营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在珠三角地区和沿海遍地开花，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潮汕人以毗邻港澳和特区的地缘优势捷足先登，实现了由“外移”到“内迁”的历史性转变。

第三，土地问题困扰。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在闽南、粤东侨乡进行社会调查并著《闽粤侨乡与南洋社会》，提出当地民众的海外移民原因主要是“人多地少”。历经大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这一矛盾非但没有消弭，而且愈益尖锐化。<sup>①</sup>

表 1 1980—1995 年汕头市海（境）外移民数量  
（单位：人）

类型	数量
家庭移民	1955
自费出国留学	1186
公派出国留学	5
香港定居	5671
澳门定居	134
台湾定居	20
总计	8971

资料来源：根据黄晓坚《一叶知秋——从澄海市侨情变化看潮汕侨乡的蜕化》一文所列资料整理。

表 2 1980—1995 年汕头市海外移民分布  
（单位：人）

国别（地区）	数量
美国	975
加拿大	587
澳洲	392
法国、荷兰、东南亚	1192
总计	3146

资料来源：根据黄晓坚《一叶知秋——从澄海市侨情变化看潮汕侨乡的蜕化》一文所列资料整理。

① 如据官方资料，隆都镇目前人均拥有耕地面积只有 0.21 亩。

以 Q 村来说，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改善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村中人口众多；<sup>①</sup>另一方面，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土地的大量租用和征用，包括农科站、高速公路、商业开发用地等，导致全村土地仅余 500 多亩，人均实际拥有土地面积只有一分半，余下的人均两分半土地则承包给村民耕种，作为村干部工资及经费。尽管潮汕地区农民善于精耕细作、素有“绣花农业”之美誉，但所生产的经济作物如杨桃、番石榴、香蕉、甘蔗等依然卖不出好价钱，农业收入微薄，导致入不敷出。在东南亚移民渠道不通的情况下，这里的许多有志发展的农民青壮年劳动力只好由国际移民转为国内流动。除了到远一点的大城市外，还有大量的劳动力在周边区域城市如汕头、潮州、揭阳打短工、零工（通常月入千余），或做小本生意，以贴补家用。

本课题组在 Q 村了解到的集体信访事件<sup>②</sup>和尖锐的“两委”矛盾，亦起因于当地极为突出的土地矛盾。而 Q 村由土地问题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及向外移民潮，只是潮汕侨乡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 三、海外移民形态的变化

由于移民世代久远，第一代移民越来越少，潮汕地区作为赡家费的侨汇收入如今已基本断绝，20 世纪 80 年代银行“批脚”（即解汇员）天天满村递送侨汇、吃百家饭的风光已经不再。不过，侨乡与海外的经济联系并未因侨汇经济的消失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旅游贸易”、“非法务工”经济的兴起及海外移民形态的变化。

#### （一）旅游贸易模式

“旅游贸易”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当时许多精于商道的村民利用新、马、泰等国对华开放旅游签证的机会，持因私护照以旅游者的身份挟带小手工艺饰品、中草药等赴国外探亲，回程则倒卖中国国内紧俏的大件家用电器如彩电、摩托车购买指标，以此解决往返旅费开销之负担，并借此博取利润。

#### 案例 1

刘先生，男，40 余岁，1993 年开始做旅游贸易，近年来主要从事中马贸易，在诗巫租房子住，有流动资金和店面。他透露，该镇最早开始做旅游贸易的（大约在 1990 年）是 R 村，当时该村几乎家家都做，利用亲戚的关系到泰国开单回国提摩托车卖。8 年前，Y 村有很多人去美、加和澳洲，少数人还到过欧洲，但最近这几年签证不容易了。他本人曾去过美国（旧金山）两次，带几只皮箱去做玉石珠宝生意。目前，全村尚有 10 人在海外做贸易，已经有少量村民与当地华人合伙开公司。走几百万马币的账回国不成问题，只要 35 马币的手续费，他们主要靠赚取外汇差价的点。他本人也持有马国银行卡，可汇 3 万马币回国。在马来西亚，中国百货、箱包很畅销，估计有八成以上箱包来自中国。他本人主要到广州进货，三元里、荔湾广场等大型批发市场均是其频繁光顾的地方。每次都是亲自进货，用集装箱运输，从广州运至诗巫，基本上每个月都回广州和潮州。他在家乡盖有房子，在潮州市区购有商品房供老婆、孩子居住。他坦承，自己和其他同伴都没有在大马定居的想法。<sup>[9]</sup>

---

① 截至 2009 年 12 月，该村有 300 余户家庭，1300 余人口。

② 在改革开放前的 20 世纪 70 年代，该村有 30.45 亩土地被公社租为农科站的试验田，并相应减少该村上缴公粮的指标。这些年来，镇农科站早已解散，但土地并未返还该村，而是遭到炒买炒卖。该村村民以当年农科站并未办理合法征地手续及提供任何补偿款，而 2004 年后国家已取消公粮及取消农业税为由，要求将该地块收还该村。

## 案例 2

金先生, 50 余岁, 出国中介, 旅行社代理, 去过文莱、印度、厄瓜多尔、巴西、欧洲、毛里求斯、古巴、洪都拉斯等地。1987 年开始去泰国探亲, 那里有其父亲的舅舅、叔叔和姐姐。去时, 带上一点香菇、紫菜、中成药、玉器等送人, 开始时值几千块钱而已(后来要上万元人民币)。看到好做生意, 就再带去卖。东西开始时随身带, 很麻烦。为了节省开支, 起初常常是几个人合住旅馆。开头叫旅馆老板带人来看货, 留下名片, 下次再去时就直接打电话联系。后来摆地摊, 走街串巷。去了 20 多次泰国。采取不定价的方式销售商品。警察常抓, 罚没东西。常被问话, 若有违规的东西如伟哥, 就会蹲监狱, 这时候老侨领就会出面去摆平。在外一般都有跟华侨社团联系。

刚刚开始探亲, 潮汕地区就已经有人做旅游生意了。隆都做得比较早, 潮安紧跟。出国手续当时国内紧、国外不紧, 持的是因私护照。那时候很多广州人还特地到汕头旅行社办理手续。1990—1997 年隆都镇去海外做生意的比较多。H 村 2000 多户、7000 多人, 最起码有几百人做这一行, 一般只要出去了就有生意做。1997 亚洲金融风暴, 泰铢贬值, 从 1 铢兑换 0.3 元变为 0.17 元。中国同年规定, 不能买电器(摩托车、电冰箱、电视机)回来, 从而影响到生意的行情。现在就很少了。去美国的很少, 因为签证难。村里有三四个人到过那里, 搞货过去卖。<sup>[10]</sup>

无论是在潮汕侨乡还是在东南亚, 做旅游贸易的潮汕人随处可见。从田野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看, 该经商模式极盛之时为 1990—1997 年, 业者一般从汕头机场飞香港转机, 或搭乘大巴前往深圳、香港搭机。他们初时往往在海外亲友家中借宿, 而后合住旅馆招徕客户专做生意; 后来则采用摆地摊、走街串巷沿门兜售的方式。由于所在国当地的严厉取缔和中国有关部门的查禁, 加上人民币升值后利润的摊薄, 从事此种方式经商者近年来趋于减少, 但贸易额却基本维持甚至有所增长。经十余年的发展, “旅游贸易”已经实现产业链的提升, 由行商转变为坐商, 由零售转变为批发, 有的还在曼谷置有珠宝城和酒店。大量的小商品货源, 均来自大型商品集散中心, 如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以及广州、深圳、潮州等地的专业批发市场。与“旅游贸易”相关的, 是国际快递、物流业和地下钱庄的兴盛。

### (二) 非法务工模式

#### 案例 1

刘先生, 50 多岁, 2002 年与 X 村其他两人一起参加一个五人组成的散游团前往韩国, 以旅游的名义抵韩后离团打工, 机票和入团费用共费资 3 万元人民币。初抵汉城, 刘先生经人介绍在一处工地打工搭脚手架, 每月有 100 万至 200 万韩元的收入。由于在工地打短工属非法行为, 工资无法通过正规银行汇回国内, 只好通过私人账户转账。后来, 他转向一家布厂打工。刘先生在布厂属正式员工, 工资也就可以通过中国银行汇回国内了。刘在韩国工作了三年, 赚了 20 多万元人民币后回国。他透露, 有不少村民于 1988 年汉城奥运会和 2001 年韩国世界杯赛时, 以观看运动会的名义前往韩国, 然后离团打工。汉城中国人很多, 但潮汕人相对较少。<sup>[11]</sup>

#### 案例 2

刘先生, 2006 年利用到韩国旅游的机会留在韩国非法务工, 在那里工作了四年多, 于 2010 年年底被韩国政府遣送回国。

刘当初之所以有去韩国的念头, 是因为他舅舅先在韩国打过工, 在舅舅牵引下, 他才步上出国打工的路程。当地很多人都是通过亲戚的牵引出国打工的, 否则就要给中介人介绍费, 通常在几万块左右, 可以分期付款。也有人为了取得在韩国的居住权, 与当地人假“结婚”从而取得在当地的居住权。这种方式通常要给“老婆”或“老公”35 万元人民币左右。

刘称,初到韩国打工时,自己不会说韩语,只能用手势跟包工头交流,或者通过翻译进行交流。当地有免费教中国人学习韩语的,不过在那里打工很忙,顾不上系统地学习韩语。刘对韩国饮食也很不习惯,因为韩国人很喜欢吃生食。住的是工厂提供的宿舍,总体上生活环境比较恶劣;待遇比较好的工厂,上班时才有专车接送。那里有很多黑工都是来自潮汕地区,所以刘与他们平时都居住在一起,也算有个依靠。

黑工在韩国的待遇是很差的。像刘先生这些黑工进入工厂,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而本地韩国人每天只需工作8个小时,并有双休日,加班有算加班费。刘在韩国每天工作是3万韩币,本地韩国工人的工资报酬却是其两倍多。如果离开工厂出去做建筑工的话,虽然一天可以赚五六万韩币,但容易被人举报而被遣送回国,风险较大。在工厂打工虽说待遇不好,但基本上都有包吃包住,所以能省下一部分钱通过银行汇回家里。作为一名黑工,在韩国不仅不能经常在公众场合露面,而且不能轻易张嘴说话。由于黑工没有受到法律保护,所以经常会被老板拖欠工资或被包工头私吞工资。

在韩国打黑工的中国人很多,除了潮汕人外,还有很多东北人。韩国政府对黑工问题也很敏感,严厉打击黑工行为。刘是被人举报遣送回国的,所以不可能再通过旅游方式到韩国打工了。<sup>[12]</sup>

潮汕人素有“饿死不打工”的传统,其在海外做贸易的遍布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但出国打工的就极为罕见。从采访到的田野资料来看,潮汕地区民众前往海外打工的国家,主要是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基本上没有。而选择去韩国、澳大利亚等国打黑工,是因那里工资较高。出国打工的高潮,大约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1994、1995年已经有很多潮汕村民往韩国、澳大利亚打工了。

在潮汕地区,出国打黑工是个很敏感的话题。这种行为不仅所在国予以严厉取缔,也屡屡遭到侨乡公安机关的防范和打击。如2000年,当地曾规定,五年时间内限制隆都人到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旅游。然而,与世界范围内的“黑工”问题一样,要解决这一问题,仍需多方长期努力。

### (三) 居留形态

潮汕地区民众出国“做贸易”、“打黑工”,其移民倾向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重点看看“旅游贸易”群体。从田野访谈了解到的情况看,潮汕侨乡频繁往返于海内外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一般都没有在海外长期定居的打算。归结起来,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中国侨乡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东南亚移民拉力的弱化。笔者及课题组成员在海内外接触到“做贸易”的商人,常常问及他们“是否已经”以及“有否考虑”在海外定居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基本上是明确、一致的,那就是“为什么要移民?”“在外面生活有什么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农耕文化浓郁的潮汕侨乡,安土重迁、叶落归根的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潮汕侨乡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与东南亚一带的社会差距已经大幅缩小甚至消失。就潮汕侨乡传统移民主要目的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国来说,只有新加坡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对新移民具有吸引力,但却存在着较大的政策限制和法律壁垒,要求移民具有较高的资金、学历和技能,而这对普通的游商来说无疑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二,缺乏向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移居的移民链,移民成本太高。海外潮人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亚,在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许多西方国家,尽管分布着大约40万海外潮人(多为印支难民),但他们一般都是三代之后的华裔,与潮汕原乡宗亲关系较为疏远,不可能提供类似美国唐人街那样移民链的支持。

第三,重视家庭团聚、重视经商贸的传统文化使然。宗亲文化是潮汕文化的核心之一,商



业文化是潮汕文化的重要特征。潮汕人重营商博利，更重家庭责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潮汕游商到了西方国家之后，并没有刻意滞留不归，而是在短期贸易博利后，最终选择了回乡。

以下笔者访谈的案例，反映了到海外“做贸易”的潮汕商人对于海外移民的普遍心态，很有代表性：

问：您哪一年去吉隆坡的？

答：1992 年。

问：是怎么去的，旅游签证去的？

答：旅游签证。

问：你们村去美国、欧洲的多吗？

答：有近百人吧！

问：你们这边去美国、欧洲的基本上不准备在那里定居，只是去做生意的？

答：我们这边没什么人有在外定居的想法。

问：为什么呢？

答：是这里的传统，这里大多数是有家庭的，不像福建那边，去英国、美国、欧洲都很多，到那边都不想回来。

问：有没有比较过，他们那边和你们这边哪里不一样呢？你看温州那边去欧洲的那么多，宁肯出几十万元也要去。

答：我们主要是以生意为主，不像他们那样，去到那边不成功是不会回来的。我们这边的人会去很多地方，但是没有那种想法，大家都是有家庭的，只是去做生意，不想去打工。

问：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潮州人在外地都很不习惯，吃的什么的都不如这边好，乡土观念特别强。

答：是的，我们这边很多人去过美国、欧洲、南美，都会回来。

问：一个都没留下吗？

答：有，这两年生意比较难一点，就定居在那边。我听说，在欧洲定居五六年就能拿到绿卡，所以有人就争取去。我们村有一个。

问：在争取拿绿卡？

答：他应该拿到了，他两个儿子已经在那边读书了。在隆都这边其实应该有十多个吧，都在美国。<sup>[13]</sup>

正如潘先生所言，潮汕商人也有部分办理西方移民的，但主要还是经商需要以及出于子女教育的考虑。他们喜欢跑来跑去，既赚到钱了，还能顾到家；也有住下来的——泰国现有一个青年联合会，都是新移民，澄海中秋联谊会都会请他们回来。因此，与福建、浙江新移民不同的是，这里基本上不存在突出的非法移民现象，非法居留海外的为数不多。

第四，东南亚国家短期居留条件的放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潮汕商人从事海外贸易的需要。实际上，近年来中国人办理国外旅游签证，也是数马来西亚、泰国的门槛最低，而这正为潮汕商人从事“旅游贸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关于在外短期居留及长期定居问题，H 村金先生这样认为：

现在所谓在泰定居的，其实都是短期居留，因为 60 岁以上的就可以办理一年多次往返。

在泰国，现在除了和当地人结婚登记外，办理定居不好弄。美国、加拿大有 5 年以上赦免、拿绿卡的说法，但泰国没有，除非泰皇、皇后、皇太后生日才有。目前涉外婚姻的很少。中国人

在泰国娶土著妇女很容易，但华裔少女就不愿意嫁给中国人。不过从趋势上看，今后会越来越多。

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去做外贸、做移民。泰国一般给旅游签证 2 个月，延期需移民局再签证。有 2 个月、1 个月、半个月和 1 周的。出境后再入境，又可以多 2 个月。<sup>[14]</sup>

海外非法务工人员的居留形态，则较为单一。他们一般都处于地下隐居状态，时间往往长达数年甚至逾十年、八年，直到身份暴露被遣送回国，自愿回国的较少。虽然这一群体实际上处于定居状态，但他们不仅无法取得合法的居留身份，而且居留生态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回国。

同侨汇一样，由海外贸易、务工赚取的外汇，经由中国银行<sup>①</sup>、外国银行信用卡、地下钱庄和自带等渠道源源不断地输入侨乡，除作为生活费用外，尚有部分外汇收入被用于投资，对侨乡经济的转型升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四、结语

改革开放后，广东潮汕地区的人口迁移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传统的海外自由移民与国内移民并重，转变为以国内移民为主、海外暂居为辅。尽管海外移民的形态及规模发生了变化，但侨乡与海外华社的联系仍然十分密切，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即以“旅游贸易”和“出国务工”为代表的新时期潮汕地区民众的海外移民形态来看，它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当今全球化条件下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国际流动在潮汕侨乡的具体体现。

“侨民”的本意是“在外旅居者”。从历史的眼光看，1949 年以前的出国华侨并无在海外“定居”的严格界定。宋人《萍洲可谈》言“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番”；“唐人住番，为工为商，十年、二十年不归，称为华侨”。在这里，“住番”与“华侨”的区别，只是滞留时间的长短而已。自清末豁除海禁后，他们可以自由往返于海内、海外，往往有“两头家”，“叶落归根”的意识很强烈，这与当今潮汕侨乡以“旅游贸易”、“非法务工”为代表的涉外经济及外移形态十分相似。而事实上，在外经商人员中，亦不乏最终选择在海外定居以及将子女接到海外接受教育并留居海外的案例。这些游走于海内外的商人，与古代、近代从事海外贸易，不时“住冬”、“住番”的海商、水客，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就是地道道、原汁原味的“侨民”！

王赓武教授在分析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移民的形态时，曾把海外移民分为华商形态、华工形态、华侨形态和华裔及再移民形态，并认为华商形态也是当代海外移民的主要类型。<sup>[15]</sup>我们看到，新时期潮汕地区民众的海外移民，正是以华商为主体、以华工为补充，二者同时存在、并行不悖。相形之下，福建、浙江等地的新侨乡则体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即一般先由华工形态进而发展到华商形态。

最近十余年来，随着老一代海外移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和新移民的断层，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华人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甚至已完全泰化），以潮汕地区为代表的归侨侨眷社会已经转变为侨属社会。这些新的侨情变化，尚未引起学界和侨务部门的重视，本文抛砖引玉，希望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关注有所助益。

#### [注释]

[1] 黄晓坚 《一叶知秋——从澄海侨情变化看潮汕侨乡的蜕化》，第四届世界海外华人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

① 以隆都镇为例，该镇 2010 年通过中国银行汇入的美金为 2 488 017 美元，资金主要来自欧美，与近年来的外汇数额基本持平（资料来源：隆都镇中国银行）。

- 文,台北,2001年;黄静 《潮汕与中国传统侨乡:一个关于移民经验的类型学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张应龙 《都市侨乡:侨乡研究新命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 [2] 《澄海市前埔乡志谱》,内部出版物,1997年,第28页。
- [3] 《隆都华侨志》(打印稿),2011年,第1页。
- [4] 汕头市委宣传部、汕尾市委宣传部、潮州市宣传部、揭阳市宣传部编 《潮汕华侨历史文化图录》(上),内部出版物,2008年,第92页。
- [5] 汕头市委宣传部、汕尾市委宣传部、潮州市宣传部、揭阳市宣传部编 《潮汕华侨历史文化图录》(上),内部出版物,2008年,第98页。
- [6] 例如,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1946年所编《三十五年度侨务统计辑要》,华侨人口居于前三位的暹罗、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其数量分别为250万、235.8335万和134.4809万。
- [7] 《1869—1934年汕头口岸进出口旅客统计表》,汕头海关编志办公室 《汕头海关志》,1988年,内部出版,第366—371页。考虑到进口人数中不少是年老还乡、落叶归根者,实际移民海外的应远远超过140万人。
- [8] 汕头市委宣传部、汕尾市委宣传部、潮州市宣传部、揭阳市宣传部编 《潮汕华侨历史文化图录》(上),内部出版物,2008年,第100页。
- [9] 2011年10月17日,在吉隆坡对刘先生的访谈资料。
- [10] 2011年8月18日,在H村对金先生的访谈资料。
- [11] 2011年7月6日,在Q村对刘先生的访谈资料。
- [12] 2011年7月8日,在Q村对刘先生的访谈资料。
- [13] 2011年8月15日,在Z村对潘先生的访谈资料。
- [14] 2011年8月18日,在H村对金先生的访谈资料。
- [15] 《王赓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Wang Gungwu, "Patterns of Chinese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R. J. May and W. J. O. Malley, ed., *Observing Change in Asia: Essays in Honor of J. A. C. Mackie*, Bathurst: Crawford House Press, 1989. pp. 33—48.